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 宝典

6

THE ASSURED BOOK OF ANCIENT ART IN XINJIANG CHINA

织物卷

新疆人民出版社



J120.92

6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章典

THE ASSURED BOOK OF ANCIENT ART IN XINJIANG CHINA

主编：孙大卫 副主编：周菁葆 曾安军

新疆人民出版社

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织物卷/孙大卫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7-228-10053-0

I.中...II.孙...III.①艺术史-新疆-古代
②织物-工艺美术史-新疆-古代 IV.①J120.92②J5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8862号

责任编辑:张卫新 胡新辉
装帧设计:一行
责任校对:杜娟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织物卷
编 著:孙大卫 周菁葆 曾安军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电脑制作:卓悦视界

印 刷:新疆恒远中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48

印 张:5

印 数:0001-3000册

版 次: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8-10053-0

定 价:48.00元

主 编	孙大卫		
副主 编	周菁葆	曾安军	
摄 影	严钟义	胡湘利	祁小山
	刘玉生	冯 斐	郭林福
	孙建明	陈 龙	孙大卫
	曾安军	刘国瑞	张昕中
	孙 悦	王 露	张 平
	王 博		

参考书目：

- 《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 《天山古道东西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
- 《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哈密古代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
- 《新疆画报》，新疆日报社，2004年。
- 《丝绸之路唐代织物》，新疆人民出版社，1973年。
-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 《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

序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外文明的汇聚地。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的是文献理论的梳理，不够通俗易懂，读者弄不明白史前时期中外艺术是如何交流的；两汉时期东西方艺术是如何在新疆交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中的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是如何在新疆发展的；唐宋时期波斯艺术、粟特艺术又是如何通过新疆而东渐的。形成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更多、更形象、更直接的视觉图像资料和比较研究。《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的出版，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在艺术史的研究中，图像与文献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艺术史应该是由作品组成的历史，作品的图像在艺术史中具有最本质的意义。图像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是当代艺术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流源，它是对造型艺术的含义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学科。一件艺术只是一个完整的物化的历史片断，是一种从时间的长河中涌现出来的凝固的、静止的记录。《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的编辑，正是为艺术研究者和欣赏者提供了原始图像资料。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丛书共有八卷，分别是石窟壁画艺术（三卷）、古代建筑艺术、古代绘画艺术、古代编织艺术、古代器具艺术、古代雕塑艺术。不仅包括了新疆现存的艺术作品，还收录了流失域外艺术珍品。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的文化内涵，真实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相互交流而创造出来的多元文化，再现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新疆艺术。

本丛书以普及新疆古代艺术知识为主要目的，对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没有涉及。其介绍基本上是立足于文物考古的发现。没有几十年来新疆文物考古界的发掘、整理，没有新疆新闻出版局、新疆文物局的关照，没有新疆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没有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协力，此丛书是难以问世的。

中央电视台两次拍摄大型丝绸之路纪录片，反映了国人对丝绸之路的极大热情。国际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关注更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本丛书的出版，将会开拓人们对丝绸之路考察和研究的视野，将会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新疆艺术的特点、价值与魅力，更会让人们认识作为丝绸之

路上的新疆艺术在文化上的凝聚力与所起的重要作用。

编辑此丛书还有一个目的，即希望学术界不要过分依赖于古代书写的文字，因为文献无证，以免我们对丝绸之路文明的记忆显得残缺不全。我们应该重视不断发现的新的历史文物，引入图像学来建立一种新的释读方式。我们相信，走出传统艺术学研究的固有程式，将是中国艺术史学获得重建的必由之路。

2006年5月



新疆古代编织艺术

周菁葆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早在公元前10世纪，中国丝绸已传入埃及，公元前5世纪已输往西欧。新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接受东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独特的西域式纺织艺术。

（一）史前时期的纺织

考古发现，公元前18世纪的草编篓，在若羌孔雀河出土。草编篓由芨芨草编织，直口，鼓腹，环底，颈部编有曲波纹和弦纹，篓口盖着褐色毛布。

公元前10世纪的毛绣残片在哈密五堡古墓出土。毛布袍残片，平纹，组织较粗疏。深绛色地，其上用黄、白、蓝、绿色毛线绣出三角形图案，色泽艳丽。构图规整，显示出史前时期新疆毛绣技术的娴熟。

公元前9世纪的毛线编织帽和毡帽，从且末扎洪鲁克墓



地出土。纺织帽用黑色线织成，口小顶略大，平顶上插一根草状物。帽弹力很大，用四种不同的编组法结成，使帽形成纹路不同的四瓣形。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毛线编织帽。毡帽为白色，用两片羊毛毡缝合而成，口大顶小，圆顶上缝有棒状角形饰，帽后开叉处有一系带。同时还出土了尖顶毡帽。此帽为二片长三角形褐色毡片缝合而成。在帽内中部至顶部充填硬物，使帽挺直，底部两侧有遮耳。此外还出土有毛织衣。用斜纹毛布裁剪为左右对襟，左右袖，背五片缝合而成。对襟，直筒形，椭圆形领，领下有一系带，袖窄短。

除上述纺织外，还发现各类毛织腰布、毛毯、毛质服饰、女式生牛皮鞋等，这些材料基本形成了史前时期新疆编织艺术的面貌。

史前遗址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即是无丝织物出现或仅有极少量丝织物出现，说明当时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因为这些毛织物的原料大都以羊毛为主。毛纤维的充分利用是人类社会科技文化进步的一个标志，尤其是毛毯的发现则是我国最古老的毛毯标本。

史前时期的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可以说是跨时代的进步。织物纹饰风格以动物纹样为艺术表现的主

体。这些动物纹饰与斯基泰艺术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在这些织物中，三角形和对三角形纹饰的应用蕴含着生殖崇拜的原始观念。水波纹和涡旋纹织物则呈现出一种和谐而自然的美感和韵律。在编织工艺方面，采用平纹、斜纹、绎织、植绒、缀织等组织结构，织造的毛布，堪称织造技术的一大进步。

出土的草蓆，其编织纹饰以几何纹饰和三角纹、折棱纹为主。关于草蓆的造型与纹饰，可能与安德罗诺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到距今4000年间，楼兰人基本上以草编器取代了陶器。这时草蓆的形制和纹饰则有了较强的独创性，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尚无与其相类似的草蓆遗物发现。

（二）两汉时期的编织

这个时期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是由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中原文化在新疆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丝织品向该地区的输入与传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批从西方传入的毛织物及棉布、装饰品等。东西方及本土艺术构成了两汉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

丝织品中典型的有公元1~2世纪的“龙纹丝织带”（局部），以绿、黄、红色丝线织出长方格龙纹，共三排，色彩各异。龙长颈、长嘴、昂首细腰，长尾高扬，四足作腾方状，形象生动活泼，雄健有力。

公元2世纪的“万世如意”锦袍，在锦上织有汉文“万世如意”和变体卷云纹。衣襟右下缘镶贴的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大宜子孙”的吉祥语。同时期还有“长寿明光”锦（局部）出土。以卷曲枝藤为主题图案，并有“长寿明光”的汉字铭文。另有“永昌锦”、“鱼禽纹锦”、“禽兽纹锦”等等。这些出土丝织物中有非常明显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同时期的出土丝织物中，也有袒胸露怀的半身菩萨像、人首马身的武士像，则是由西亚传入的古希腊艺术的内容。

除此外，还出土有“栽绒鞍毯”。此毯近正方形，出土时覆盖于马鞍上，故名“鞍毯”。中心图案为横列小菱形纹，内填以叶纹，四周有一组顺式二方连续曲折与大树叶纹组成的纹样，外框则以小色块与斜纹组成连续几何纹，四角缀穗结扣称为“突厥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鞍毯。还有“武士像毛织壁挂”（局



部)。此壁挂原位在人首马身之下，显然为古希腊文化影响之产物。

“蓝地白花纹棉布”，则采用防染法，显露出白色花纹图案，由朵花、圈点、曲长线、钩连等纹样上下横列组成图案。这是新疆现存最早的防染法棉布标本。

缂毛则是彩色毛织品，用“通经断纬”织花法织成。两汉时期有“三叶花缂毛”和“字边几何纹缂毛”出土。另外还有“毛织衣”、“毛布男裤”、“栽绒毯”等织品出现。

两汉时期新疆丝织纹样中，有云气纹、动物纹、文字纹、茱萸纹，还有几何纹、瑞禽纹、植物纹以及羽人、东王公、西王母等纹饰。这些纹饰常常相互交错出现，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图像模式。

汉代丝绸品种主要为锦、绮、绣、绦、罗、纱、绢、染纈、缂丝等。其中锦、绮、绣等较为名贵。新疆出土丝织物多为此类。但是，源自中原的刺绣艺术在新疆地区传播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形的转变。特别是云纹绣之类的刺绣品以及单线式涡卷纹刺绣等，其纹饰具有典型的西域风格，这亦是本土艺术与东西方艺术融合的典型例证。

其次，出土的汉代丝织物在染色方面与西汉以前的中原

丝织物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丝织物大都突破了过去以同类色与谐调色为基调的“中和”性色彩模式，呈现出丰富饱满、对比强烈的色彩体系。这不但是在利用天然染料、染色方面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审美观变化的反映。

两汉时期新疆的毛织物，不仅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极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织物艺术上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面貌。这时期纹饰图案题材多样，主要有几何纹、花卉纹、动物纹和人物图像等。许多织物的纹饰突破了一般实用性织物图案化的表现形式，依其生动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制作技法创造出了极具艺术性的经典之作。

两汉时期的毛织壁挂采用通经断纬的综织方法织成。人物造型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圆睁的大眼睛和变化丰富的面部层次结构，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希腊古典艺术写实风格。毛毯的纹饰大都以几何纹、龟背纹和花草纹为主。较完整的毛毯显示出四周带有多层边框的图案。毛毯残片虽历经千年岁月，色泽依然如新，反映出两汉时期新疆居民已具有熟练的染色功能。

除丝织物和毛织物外，棉织物在两汉时期的织物艺术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棉花原属热带植物，最早起源于印度。考古资料证实，至少棉布在汉代就已出现在



西域。尼雅遗址出土的蓝白显花的棉布，堪称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棉布实物。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物艺术

这一时期的织物主要有鸟纹刺绣，汉倭二体锦、右寿锦、对人兽树纹罽、狮纹织锦带、几何纹和花卉纹毛织物及狮纹毯等。

这一时期的织物精品多由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公元4世纪的“禽兽纹锦”，是藏青色锦地、棕、蓝、绿色显花，黄色线勾出图案的轮廓。怪兽头上长角、身后生翼，尾上卷或下垂，龙爪形足。整个画面横向布局，上下对称，构图繁缛，线条均匀流畅，同时出土的有“对鸟对羊树纹锦”。锦地深绿，纹饰用红、黄、棕、白色彩线织出中间是一排呈塔形的灯树纹。树下卧有一对称的长角羊，两侧是对称的小鸟。图案设计规整，花纹简约质朴。此外还有“吉字纹锦”、“夔纹锦”、“盘绛狮象纹锦”、“联珠胡王锦”、“骑士对兽纹锦”、“树纹锦”等等。

阿斯塔那古墓中还出土有“套环贵字纹绮”，是平纹组织，浅绛色地上紫绛色显花。图案由各式团花套环组成，双

线中夹连续钩藤纹或如意形相套连的圆环。环内夹的“贵”字，双鸟纹。线条圆润，构图复杂，质地薄细透明，反映出这时新疆传统丝织技术已经有了高度发展。

另有“富且昌宜侯王夫延命长”编织履。鞋底用粗底线编织，呈土黄色。鞋帮用色泽鲜艳的彩色丝线编织。丝线颜色有红、白、黑、蓝、绿、杏黄、褐色等。并用红、蓝、黄三色线织出“富且昌”、“宜侯王”、“夫延命长”汉文字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物依然是以内地传来的丝织物和西方传来的毛织物以及本土织物为主要来源，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织物艺术的总体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内地养蚕、织丝等技术已传入西域，并得到迅速发展。

此时期新疆的丝织物主要有锦、绮和刺绣。“织锦”在组织技法上主要还是汉式的经线显花的平纹复合组织。“绮”依然为汉式的经斜线显花的平纹组织。相对于两汉时期的丝织物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丝织物造型手法及艺术风格更趋本土化特征，其典型作品有汉佉二体锦、鸟纹刺绣及狮纹织锦带以及类似佉卢文文字变体图案的织锦等。

毛织物则属当地所产。其纹饰趋于几何装饰化，色彩



丰富、饱和，制作工艺愈加精湛，在艺术风格上除保持传统的本土艺术特征外，也吸收了一些犍陀罗艺术常见的图案形式。

另外，狮纹毯图案造型夸张，神态生动，层次变化丰富，显示着浓厚的西亚造型风格。人兽树纹则呈现出典型的希腊化特征。其人物卷发、高鼻、大眼睛的造型与古典雕刻中的人物形象十分近似。可以明确认为，它们是在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具有西亚和中亚民族特征的艺术形象。

（四）唐宋时期的纺织

唐宋时期新疆丝织品仍然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可见。其中的联珠鹿纹锦，为土黄色地，黑、绿色显花。纹样简练明朗。联珠花环内饰一雄鹿，鹿体肥大，举步轻捷，多枝巨形花角后弯，项系绶带后飘。身上饰有锯齿纹、三角纹和圆圈纹、山形纹。这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西域织锦。

同墓还出土有联珠对鸡纹锦，为黄色地，红、白二色显花，图案横向排列，椭圆形联珠花环内是两只站立在方形物体上的对鸡。头顶华冠，项系绶带，虽用色不多，但美感极强。类似的还有飞凤团花锦，联珠鸾鸟纹锦等。